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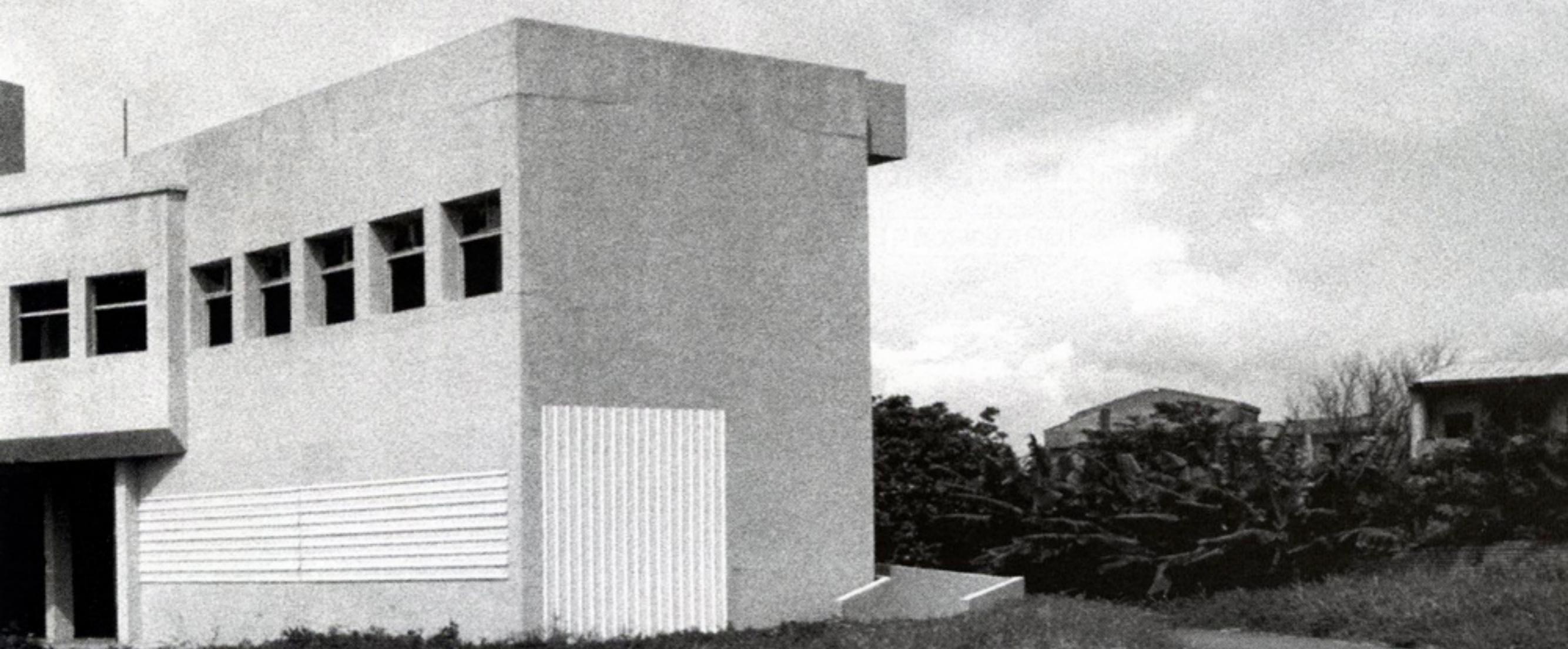
“海市蜃楼” 愿景破灭后的现实场景 WHAT AFTER THE VISION VANISHED

文 / 李廉 图片提供 / 姚瑞中 + 失落社会档案室 编辑 / 袁菁
Text / LI NI Photos / YAO Jui-chung + LSD Editor / YUAN Jing

人们认为，艺术家对“废墟”的关注偏重静态的美学鉴赏。在台湾，有一群人关注的却是废墟的“过去”和“未来”——废墟何以沦为废墟，以及如何能使废墟“活”过来。艺术家姚瑞中和失落社会档案室(Lost Society Document)的“海市蜃楼”计划属于前者。他们踏遍全台湾，用黑白影像和文字记录下“蚊子馆”——花费纳税公帑建立但因故闲置“养蚊子”的公共建设。当发展主义大旗被高举挥舞刺激人们着眼未来，当普通人烦忧于“今日之日”而将废墟定格在过去，认定“昨日之日不可留”时，姚瑞中和LSD却试图回过头来看看这些“过往愿景幻灭后的现实场景”。为了“活化”闲置空间，政府最常用的方式是BOT (Built-Operate-Transfer)，将闲置空间的改建和营运权发包给私人财团，但这种方式往往造成活化失败，蚊子馆的“万里江山”得以永固。为了打破财团垄断的方式，艺术家和其他非营利组织以不同的方式探索闲置空间的“再利用”，并介入、参与社区的运作。台南海安路的艺术造街、西螺艺术兵营与大地之屋、宝藏岩艺术村落的尝试让人们发现，对“海市蜃楼”的追逐并非遥不可及，行动才刚刚开始。



云林县仑丰公有零售市场 摄影 / 陈生湖、黄婷筠



蚊子馆江山万里图

文/李霓 图片提供/高俊宏 编辑/袁菁
Text/LI Ni Photo/KAO Jun-Honn Editor/YUAN Jing

台湾艺术家高俊宏根据陈东升1995年《金权城市：地方派系、财团与台北都会发展的社会学分析》书中图表加以延展，制出这幅“蚊子馆江山万里图”。台湾的公共工程已经演化成一套“雨露均沾”的系统。立法院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条例，包括“行政院国土活化条例”“都市更新条例”“文化创意产业条例”等，都更和文创产业成了一门“好生意”。而目前常见的“民间参与”方式基本上是BOT/ROT/RO等，即由私人财团承接公共设施兴建与营运。再加上公共建设已经成为当选者酬谢地方桩脚（注：指选举中在基层为候选人拉票的工作人员）的利益输送带，在很多地方，这些“好生意”可以“关起门”来做了。由地方派系把控的建设公司通过“假竞标”的方式直接获得建设营运权。地方派系直接参选进入地方行政体系，各类审议都更或地价的委员会效用不彰，反而成为扭曲地价的帮凶，而地方行政官员往往会在建照、审议等行政方面给予支持配合。这样一来，纳税人建立起的国库养起了各类蚊子馆、蚊子园区、无用的文创产业，以及冲突不断的都市更新争议。



**《海市蜃楼：
台湾闲置公共设施抽样踏查》**
作者：姚瑞中+LSD失落社会档案室
出版社：田园城市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9月
售价：NTD 480

**《海市蜃楼：
台湾闲置公共设施抽样踏查Ⅱ》**
作者：姚瑞中+LSD失落社会档案室
出版社：田园城市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10月
售价：NTD 480

**《海市蜃楼：
台湾闲置公共设施抽样踏查Ⅲ》**
作者：姚瑞中+LSD失落社会档案室
出版社：田园城市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10月
售价：NTD 480

《台湾废墟迷走》
作者：姚瑞中
出版社：田园城市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6月
售价：NTD 350



建成圆环 摄影/张若琪、曾馨怡



1960年建成圆环全盛期

图片/台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都市更新处资料



1944-1945 建成圆环及附近道路

美军航拍图 图片/国家文化资料库

档案 台北市建成圆环

设施机关 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与南京西路的交叉路口(旧建成区)

主管机关 台北市政府

管理机关 台北市市场管理处

建造日期 2002年1月7日

建造经费 约两亿元新台币

台北建成圆环 TAIPEI JIAN-CHENG ROUNDABOUT

文/李鼎 编辑/袁菁
Text / LI Ni Editor / YUAN Jing

位于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与南京西路交叉路口的建成圆环，成形于20世纪初的日据时代。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袭、战后至六十年代的全盛期和之后的衰落，年逾百岁的建成圆环像是进入暮年久治难愈的老人。马英九、郝龙斌两任台北市长先后花费两亿多新台币改建建成圆环，拆除了原本的建筑，建造起玻璃帷幕打造的“新圆环”。但在多次招标BOT (Built-Operate-Transfer 政府规划-委托民间资本投资建设运营-转移交由政府运营) 委外经营中，多次流标。为了吸引人流炒高人气，建成圆环的运营商尝试过各种策略，举办创意市集、美食小吃馆、引进日本花鸟园，甚至邀请变性艺人作秀，但纷纷落魄收场，圆环日趋凋敝的状况没有丝毫改变。建成圆环再生案已被视作台北市政府的一大败笔，大部分时间

新圆环的玻璃帷幕上都贴满了各类广告，两亿元建起的“广告位”只能尴尬地站在哪里。只有在选举期，建成圆环偶尔会作为竞选人嘲讽政治对手的“造势背板”暂回人们视线。

小贩占领圆环

清朝刘铭传任台湾巡抚期间，兴建台北至淡水的铁路，圆环所处地区逐渐繁荣。日据时期，台湾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存在道路狭窄弯曲、交通不便的问题，因此日据政府从1899年开始先后对台湾25个城市进行“市区改正”计划，模仿巴黎凯旋门大圆环和辐射道路的设计，计划在台北修建两个圆环，一个是西门町，另一个就是建成圆环。

1908年，日据政府在几条道路（即今天的重庆北路、南京西路和天水路）交汇处划了一个圆圈，在圆圈中央种植榕树，外围种植七里香，供居民休憩，“圆公园”就此形成。由于附近大稻埕是当时著名的风月场所，再加上建成圆环临近火车站，建成圆环所在地区人流量增大，各类摊贩纷纷占领圆环，并逐渐发展成规模。最初摊贩被视为非法聚集占道经营，常常被警察取缔驱逐，直到1938年建成圆环的摊贩自发组成了“台北行商组合圆环夜市”并规定每日营业时间由下午5点至午夜12点。自此，圆环成为一个合法的夜市，一时摊贩云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圆环生意大受打击，为了应对空袭，圆环中央修建大蓄水池，周围修建防空壕。二战结束后，防空壕拆除，蓄水池填平，战时散落的摊贩又迅速回流到建成圆环。五十年代摊贩共同募集资金将零散的摊头档位改建成铁皮屋的规模。圆环在六十年代进入全盛期，一度成为台湾最有名的夜市。

随着台湾经济发展，机动车辆的增加，“都市道路圆环”不再能应对道路拥堵的问题。台北市区大部分的都市圆环都被拆除，如八德路圆环、南京东路圆环以及基隆路底的正气桥圆环，代之以槽化处理（改圆环为多个交通岛，分散交通冲突点）或十字路口形态。而建成圆环则被保留下来，台北大学都市计划研究所的研究生张文怡在对建成圆环再生案的反思中指出，和同样被保留下来的仁爱路圆环一样，建成圆环具有特殊的“文化景观”功能。建成圆环是台北唯一一个在都市圆环中进行“小吃市集活动”的地点。小贩占领圆环的行动“将西方绝对几何的空间形式消化为具实质活动机能的生活空间”。

建成圆环的衰落

随着台北都市的扩张，台北市发展中心逐渐转移到东区，士林、公馆等地区的夜市慢慢兴起，原本兴盛的圆环夜市规模缩小。七十年代，建成圆环四周道路逐一拓宽，车流庞杂，使得在圆环逛夜市变得不再安全，夜市迅速衰落。1993年和1999年，建成圆环遭到两次火灾肆虐，铁皮的圆环建筑更加残破。2001年台北市政府决定拆除建成圆环，2002年，前台北市长马英九决定重建建成圆环，由曾主持修建台北101大厦的李祖原建筑师事务所设计新建圆环美食小吃街。新建成的圆环不再是铁皮屋，而是玻璃帷幕建造的圆柱体独栋建筑。

新圆环商城启用后却运营惨淡，玻璃帷幕通风差，原本的西晒问题更加严重，空调成了建筑内部的必备品。但即便付出高额电费也不能换回足够的人流。主持蚊子馆踏查行动的姚瑞中认为，一些建筑师的作品并不能与台湾的庶民文化结合。“我们有一个‘好学生’的概念：父母是中产阶级，小孩受到很好的教育，进一流大学，去国外念研究所，这些好学生很会念书，也很认同西方的一套理论体系，回来以后他们把西方的一套理论搬回来，但却没有考察台湾庶民文化的情景。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shopping mall，而原本的小巷弄早已被铲掉了”。

BOT的模式也遇到了困难。2006运营不到四年的新圆环正式歇业，台北市政府收回圆环，2007年再次通过BOT委外经营，在两次流标之后，华旭公司以一千万权利金（注：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时，民间机构向政府支付相应金额以获得兴建、营运权利）取得了建成圆环2007至2016年共九年的营运权。2009年，圆环重新开幕，但仍然惨淡经营，只有六七家摊商进驻。华旭公司被指责作为“二房东”向进驻圆环的租户收取高额房租，最终仅存的一家“圆环流水席”也因生意不景气和高涨的房租而歇业。新开张不到两年，建

成圆环在2011年再度全面歇业。

点状规划的困境

张文怡回顾比较了历年来建成圆环的五个改善方案，包括1975年“建成圆环交通改善措施”1986年“建成圆环改善方案之研究”1989年“台北市都市更新长程计划——南京西路圆环附近地区都市更新计划案”1996年“台北市地区环境改造计划——建成圆环再生方案”以及1998年“变更台北市大同区建成圆环公园用地为广场用地（计划性美食中心）计划案”她认为建成圆环之所以衰落，除了与新的“玻璃圆环”建筑设计失误以及BOT运营商不合理加租有关之外，还与每一次“再生案”的“点状规划”有关。

五个规划案中，只有1989年“台北市都更长程计划”是涉及较大范围的规划，此外其他几个规划方案的范围仅限于建成圆环及宁夏路，没有接到整体规划及配套改善措施。而“台北都更长程计划”也只是偏重概念性的规划构想。1993年大火和1999年大火之后，台北市政府出于行政效率优先的考虑，点状改善最容易看到成效。建成圆环的所处的大同区环境老旧，缺乏公共设施比如停车场。张文怡认为，在只着眼建成圆环的点状规划思维下，系统性的开放空间是无法提供的。以上提及的几个规划案都关注圆环的硬体建设，并没有对周围交通设施进行改造。而正是建成圆环周围道路的拓宽改造工程加速了圆环的衰落，脱离这些讨论如何把人拉回到业已凋敝的圆环，就只能看到黔驴技穷的运营商组织零星的美食节或变性艺人秀。

同样，点状规划的思维也体现在建成圆环所在的大同区。大同区近年面对诸如商业机能萎缩、交通设施不足、居民居住条件简陋等问题，这是整个区发展上的瓶颈。台北市针对大同区也推行了许多都市更新方案，但这些规划方案针对的大同区内不同的区域，如“大同区整体规划发展计划”“大稻埕整体发展计划”“建成圆环再生案”等，但这些不同更新计划之间缺乏联系。

建成圆环由最初被小贩占领争取合法性，到挺过战争烽火成为台北夜市的代表盛极一时，它曾凝聚了一代人对台北美食的记忆。一百多年后它却久病难愈，历经两任台北市长，花费巨大也难以看到起死回生的可能。点状规划让营运者与政府都着力于如何把人拉回到圆环市场，却无力解决周围公共设施如停车场的缺乏，以及圆环路口的交通问题。营运者与政府组织的活动包括美食节、创意市集等都不能根治问题，只能算是失效的镇痛剂。多个政治人物在建成圆环前许下的承诺早已幻灭，今年2月，连胜文选择在建成圆环前宣布参选台北市长，不知这一次，圆环的命运又将如何？



建成圆环 摄影／张若瑀、曾馨怡

废墟洞见历史 RUINS: A WITNESS TO HISTORY

采访 / 李霓 编辑 / 袁菁
Interview / Li Ni Editor / Yuan Jing



城市中国

Q A

姚瑞中

Q 您曾表示蚊子馆踏查还是相对软性的一种行动，您如何界定这种“软性”？

A 我们采取的方式并不像街头抗争那样激烈。蚊子馆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独立事件，它面对的台湾社会病症是慢性的，而结构性问题只能回到结构的层面去谈。我们所做的第一个就是透明化，让大家知道都有哪些蚊子馆存在，把每一个案例的负责部门、所花经费，以及建设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我们也把《海市蜃楼》的书寄给了立法院、市议员、电视台等等。资讯公开之后造成舆论压力，对监督部门产生压力，民意代表、立法委员、市议员、县议员就会去紧盯行政部门的人，之后就有了活化蚊子馆的举动。所以我们理想的方式是透过外部的舆论压力去促使他们进行内部的改革，这样的方式其实比较“温柔”。

Q 在操作层面，最初怎么发现这么多蚊子馆，踏查之前有事先拟定名单吗？

A 没有 我们完全不知道蚊子馆在哪里。最常用的方式是学生利用假期回家问亲朋好友，然后顺藤摸瓜去找。在台湾，很多地方的公共设施都是地方自筹经费所建，盖完之后也没有人去管控，这种体制上的漏洞造成我们很难通过公开的文件去发现这些公共建设。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谷歌地图、脸书、部落格等去搜集，像脸书上有一个“台湾废墟研究”的主页，不过网友发现的很多私人废墟不是我们关注的范围。最开始搜集的时候，很多信息非常难找到，大部分的蚊子馆都没有被报道过，网络也没有，在当地只有当地人对黑金贿选的口耳相传，很难搜集到可信的证据。对于这些我们只能通过各种人际关系去搜集求证，求证对象包括警察、里长，或是当地反对党的服务处。比如台北市是国民党执政，直接问国民党议员往往得不到回答，所以我们就去问民进党的议员。我们找的政府机关包括监察院、审计部和公共工程委员会，他们的公报和控管资料会有帮助。迫于舆论的压力，现在他们的官网上都已设立举报的渠道。

Q 在批判BOT/ROT等模式的同时，您曾经提过一种设想，应该打破仅由私人财团承接公共设施建设营运的模式，政府应该释放空间给非营利组织去营运，这种设想在台湾有实践过吗？

A 有，但比例比较少。有一些蚊子馆的活化是交给慈济慈善基金会去做的，他们会做一些安养院（注：如原高雄市旗山农民休闲中心被活化后成为佛教慈济基金会旗山联络处）。政府手上有很多闲置的土地和空间，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怎样赚钱，所以都直接给财团去BOT 可是我们要提醒的是，当你全部BOT之后，不一定会带来正面的收益，很多时候可能会带来负面的能量。比如，很多农村人

口外流之后只剩下幼儿和老人，如何安置这些人口就成了出乡打拼者的负担，还有隔代教养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些偏僻地方的一些或闲置或的乡校和公交机关大楼改造成安养院、看护中心、托儿中心，只要减低当地的负担基本上就是帮助这些人了。没有必要再去立项花钱盖一个新的服务中心，或者cultural park之类，这些对当地人来说没有意义，观光客也不会去，只会沦落为蚊子馆。我们呼吁政府，不能将所有的公共建设都BOT 应该释放一定空间给艺术家，所谓的文创工作者。台湾目前已经有几个艺术家发起的工作室和聚落，他们把废弃的厂房或学校改造成工作室，也对所在社区有一定回馈。

Q 蚊子馆中有很多涉及文化创意产业园，您怎么看待这几年台湾文艺界对文创产业化的反对？

A 文创基本上是一个骗局，对于艺术工作者而言 从来就没有“文化创意产业”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本身是从英国的creative industry创意产业来的，当年英国推行的时候本身就有工艺艺术的基础。1998年以前的台湾并没有这个概念，而是“社区总体营造” 目的是弥平城乡差距。1998年文建会组委陈郁秀上台后开始提“文化创意产业” 其实就是把所有文化都变成商品，商品化就意味着有生产模式、行销模式，生产线不断制造出复制品或是类似的商品，但很多抽象的文化概念是无法被商品化的。所谓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实际上是在为商业背书。文化创意产业被解释为十几个项目（包括视觉艺术产业、音乐及表演艺术产业、文化资产应用及展演设施产业、工艺产业、电影产业、广播电视产业、出版产业、广告产业、产品设计产业、视觉传达设计产业、设计品牌时尚产业、建筑设计产业、数位内容产业、创意生活产业、流行音乐及文化内容产业，和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制定之产业）每一项都会有对应的预算去扶持。文化部与12家公司签约，委托这些公司进行文创投资评估和管理工作，一些公司甚至是在文创条例通过半年前成立的空壳公司。所谓“扶持” 就是这样的公司拿了与预算，再转包给其他公司层层分包。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所有的文创园区都是财团统包，再分包给下游厂商。园区里面有很多咖啡馆、小工作坊、画廊。可是，这些园区排除了一些东西。很多具有争议性、社会批判性的艺术被排除，涉及政治、宗教、情色的议题全部被过滤掉。只剩下“小清新” “小确幸” 因为这些东西不会威胁企业的形象，也不会造成争议性的威胁，争议性的东西很难贩卖，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园区都在卖东西，卖的都是“安全” “可爱” “讨人喜欢” “漂亮” 可实际上台湾的艺术发展有很多文化批判的精神内涵，但这些都在文创园区中消失不见了。◆